

DOI:10.16515/j.cnki.32-1745/c.2017.04.015

# 海外华人获得语写作探析

李 静, 蒋方圆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1331)

**摘 要:**在世界文学走向融合的过程中, 华人获得语写作研究逐渐成为显学。通过对获得语作家与本土作家、华裔作家、新移民作家等作家群进行比较, 进一步确认获得语作家在社会文化语境、身份认同、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独特性、创新气质和自觉意识。

**关键词:**获得语写作; 获得语作家; 社会文化语境; 身份认同; 创作风格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31X(2017)04-0067-04

## A Study on Acquired Language Writing of Overseas Chinese

LI Jing, JIANG Fang-yua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tegrating of world literature, the study on Chinese acquired language writ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distinguished school. In this paper, we have further confirmed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acquired language writers on their socio-cultural context, identities and their writing style through a series of thorough and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s with mainland writers, ethnic Chinese writers and Chinese emigrating writers.

**Key words:** acquired language writing; acquired language writers; socio-cultural context; identity; writing style

海外华人文学可分为三个部分: 留居者华文文学、留居者外语文学、留居者后代外语文学<sup>[1]</sup>, 即华文文学、获得语文学和华裔外语文学, 其中移居海外的留居者外语文学就是获得语文学。获得语作家是指留居海外、使用获得语(居留国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群体。华人获得语作家散布在世界各地, 他们运用获得语写作, 并有一部分作家成就非凡, 进而融入居住国主流文学体系。第一位用获得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是清朝时期驻法国外交官陈季同, 他的作品主要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 2005年新生代青年女作家李翊云出版的小说《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已获得6个国

际文学奖, 由该小说改编的电影获得了西班牙金贝壳奖。获得语作家作为一个群体, 与本土作家、华裔作家和新移民作家相比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因此, 本文拟通过对获得语作家与其他作家群在社会文化语境、身份认同、创作风格等方面的比较, 挖掘其共性和个性, 以期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有益探索。

### 一、社会文化语境: 传承与变异

本土作家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用白话文进行写作的、土生土长的国内现当代作家。“五

收稿日期: 2017-06-30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CDJSK11096)

作者简介: 李静(1975-), 女, 河南洛阳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符号学、叙述学研究。

四”时期,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西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碰撞。文人站在传统的对立面“重新估定一切价值”<sup>[2]</sup>,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1949年以来,本土作家的创作经历了“文艺服务于政治”为主线的报告文学、“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阶段。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文学崛起并挤压“精英文学”和“严肃文学”的生存空间。虽然受传统文化影响,本土作家在创作上始终未曾偏离传统文化的特质,但不断变化着的经济政治形势也对其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表现在:一是随着整合互动日益密切,文艺指导方针愈发多元和开放,在创作上本土作家与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方向大体保持一致;二是随着主流价值观的转向,作家在创作时依然和社会保持一种良好的默契,承担起书写和传播社会主流意识的责任;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作家写作主要是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这是中国传统文人忧国忧民、关心社会、文以载道的典型特征。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介入,写作“市场”呈现作者多于读者的局面。文学创作的题材明显受制于文化消费和大众传媒以及“快餐文学”消费需求的影响,出现表面繁荣和“表层消费”等问题。

华裔作家是指留居国外的华人后裔中进行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通常用中文或者居留国语言进行创作。以美国为例,从1887年李恩富发表《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起,美国华裔文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华裔作家也从被忽略到被关注,并涌现出汤婷婷、唐恩美、赵建秀、任碧莲等一大批华裔作家,他们逐渐进入主流文学体系。华裔作家尤其是第三代以后的华裔作家基本不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他们倾向于书写来自居留国的各种“压力”,以及在“种族”“性别”“政治”等方面追求平等的诉求。华裔作家追溯他们从何而来,由此确定自我的“形质”。与获得语作家相较,这种“形质”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他们心中的一方“乡土”,可能是个体的起源地,也可能是祖先、种族的起源地,既是个体记忆的象征,也是集体记忆的象征,既是有形的山水,也是无形的意象<sup>[3]</sup>。总之,华裔作家所处的现实语境与居住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基本一致,而获得语作家则始终无法跳脱自己的文化身份,其文化的“根”、心理状态和故国有着斩不断的联系,这就造成了二者在创作的出发点和侧重点的差异。

新移民作家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内成长并接受基础教育、而后移居国外的创作群体,其代表作品有严歌苓的《天浴》、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郑念的《上海生死劫》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角度诉说了时代背景下的爱欲纠葛和世情冷暖,深入探讨了人性的善恶,表达了对生活的控诉与无奈。新移民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更贴近现实国情和世界形势,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如果说初代移民是由于饥荒、战乱或贫穷等原因背井离乡,那么新移民追求的是一种自我放逐。此外,初代移民中的体力劳动者居多,他们大多体会到的是生存的艰难;而新移民大多是留学生,他们文化程度普遍较高,经历的苦难多是精神的苦难<sup>[4]</sup>。新移民族群的出现,催生了更加绚丽多姿的海外移民文学,这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成员,也是华文文学研究拓展的新视点。黄万华教授指出:“(新移民作家)从现实功利性的种种关联中解脱出来,在时间所指上也滤掉了现时代的特征,从而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中华性’。从新移民写作‘香蕉人’形象中,原先数典忘祖、文化失根的叙事轨迹被代之以中西文化互补层面上的某种体认,甚至‘双重排拒’也不只是生存的悖谬,而有超越的意义。”<sup>[4]</sup>

获得语作家和本土作家、新移民作家一样,走出国门前,他们都处在相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中,三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语境上。与本土作家不同,获得语作家走出国门后接受了一种再教育,甚至转换了语言。他们不再和本土作家享有共同的语境,却避免不了中西方双重语境的“夹攻”,因而容易对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表现出迷惘。获得语作家和华裔作家在文化语境上也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从他们所接受的文化传统这条“根”来看,获得语作家是与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早期的获得语作家主要因战乱远涉重洋,对祖国的思念是他们心中永远的伤痛和解不开的心结。获得语作家虽然用居留国的语言进行创作,但他们会关注祖国的发展,并在作品中展现。获得语作家和新移民作家一样是在国内接受教育之后才移居国外的,他们的艺术思维方式、感情表达方式、创作方法和表现方法等无不体现了中华文化这条“根”。移民之后他们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在与异族文化的碰撞和交汇中,又融入了“非中国元素”,所以他们笔下的中华文化是能够与他种文化交流和互动的,

同时,又能承传和发扬本民族特色,以民族文化的“生命活态”,参与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大潮中。

## 二、身份认同:客观的“中间人”

在身份认同这一问题上,最值得讨论的两个群体是获得语作家与华裔作家。作为生活在“世界之间”(between worlds)的人,同样身处双重甚至多重语言、文化、历史、阶级语境中的获得语作家与华裔作家却大有不同。华裔作家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复杂的、变化着的、动态的。如美国华裔作家陈耀光曾发表过所谓“建立新的华裔美国身份”的言论:“我们必须抛弃华人或白人的身份意识,抛弃二者之后达到的平衡,才可能形成华裔美国人的身份意识,华裔美国现在还不存在,但随着我们的努力,它会冒出来。”<sup>[5]</sup>这些作家认为自己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居留国”的人,这种双重“排拒”是他们对于自己身份认同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对“同化”(assimilation)和“效忠”(loyalty)这两种华人文学的研究范式多有批评<sup>[6]</sup>。相较华裔作家,获得语作家既没有强烈的“寻根”意识和中华意识,也没有华裔作家那种“华裔感性”或“亚裔感性”的独立意识。他们往往以第三人的视角,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身份。获得语作家少了华裔作家强烈的“民族意识”“归属意识”,甚至对“身份意识”本身也没有那么执著,他们以更加客观、理智、包容的姿态走出了“文化冲突”“代际关系”“民主权力”等窠臼,成为客观的“中间人”。

## 三、文艺风格:跨文化的创作自觉

从创作风格来看,本土作家的作品蕴含着更多的使命感和家国情怀,而早期华裔文学作品大多属于自传体文学。创作内容往往以家族或个人的经历为蓝本,重在描写早期华人、华裔在国外的奋斗史,表现华人移民在国外创业的艰辛以及他们的淘金梦、发财梦,同时又描写了他们背井离乡的孤独,对故乡的眷恋,以及面对家庭关系、代际沟通、文化碰撞时的不适。体裁上,小说、诗歌、剧作兼而有之,并以小说成就最高,受众最广。华裔作家把自己放在一个与故国母体没有现实联系的位置,他们的立场全然是所在国的,因为他们生来就是那个文

化母体的人,受其滋养,他们的表达也会更加直接、凌厉。不管是在表达自身“亚裔感性”、争取所在国公正待遇还是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书写上,他们全然没有顾及自己的中华血脉根基。新移民作家和获得语作家的文艺风格比较近似。在选材上,新移民作家更多的将重点放在对国内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或者是在国外遇到的困难、挫折和遭遇的文化冲突上,这一点在留学生作家群体和初到异国的新移民作家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获得语作家的作品则体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

同样接受本土教育,本土作家与获得语作家虽然都接受了国内的教育,但由于后天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创作风格和表达主题也有很大差别。在题材上,“伤痕文学”的控诉凸显在人性 and 人文关怀缺失上,而获得语作家表达的却是更为直接有力的对制度等更深层次的思考。获得语作家的创作风格独特,他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以冷静的姿态书写乡土、历史、苦难的岁月和在国外生活的点滴,他们似乎更愿意讲“中国的故事”,这是传统文化赋予他们的独特魅力。获得语作家对祖国的书写基于自身的体验,而不是刻意迎合西方读者心中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而这种迎合在部分华裔作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此外,获得语作家虽然身处海外的大环境,但是在书写自己的文化境遇或者是批判国内社会历史或现实的时候往往更加委婉、含蓄。他们的方式是比喻的、象征的,这从他们作品的名字可以看出,典型的例子就是闵安琪的《红杜鹃》和李彦的《红浮萍》,这里的“红”代表的是“时代的血色”,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喜庆的红色形成对比,更显悲剧性色彩和人性关怀。获得语作家与新移民作家的主要区别是创作语言的不同,并进而导致两者在创作风格上愈走愈远。正如美国华文作家、评论家陈瑞琳所说:“新移民作家的创作显得声势凌厉而浩大。他们的一个突出精神特征就是……能够在自觉地双重‘突围’中重新辨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在‘超越乡愁’的高度上来重新找寻自己新的创作理想。”<sup>[7]</sup>

总之,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决定了获得语作家比华裔作家更具跨文化的自觉和独立身份的自觉,这种自觉更容易创造出超越国别、种族、语言的文艺作品。获得语作家来自移民群体,他们吸收了其他几类作家的特点,并占据了创作高地。他们避免了过于强烈的身份意识,没有华裔作家所谓的“亚

裔感性”,不用刻意反对自己作品中所体现的东方文化血统。用获得语进行创作表明他们具有相当的语言水平,而在获得语的作品中表现出东方文化的血统则表明了他们对文学创作技法高超的驾驭水平,更具创新气质。获得语作家弥补了本土作家“形而上力量不足”的遗憾,更有自觉意识。海外作家群体重视从“民族”和“传统”中寻求突破<sup>[8]</sup>,获得语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包含的不只是传统文化和社会环境,还包括了不断寻求突破和改变的文化、心理、身份等方面的特性,因此他们相对于其他作家群,更具文学的创新气质和自觉意识。

#### 四、结语

获得语作家写作用的语言是外语,但思想意识却是中式的,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用一种后天习得的语言诉说自己、家族、同胞和国家的故事,将中国书写带向世界。他们的作品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也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我们可以从作品中追踪他们“中文构思”的过程。甚至,他们写的外语也是一种特殊的、落在两个语境夹攻中富有“边缘性”和“流散性”<sup>[9]</sup>的外语。可以说,他们的作品既是外国文学,又是中国文学。他们或试图融入西方文化之中,或努力想要留住中华文化的“根”,或在二者之间徘徊。

通过对几大作家群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文化身份、艺术风格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拓展了本民族原来的文化、文学形态,展现其因异质文化的渗入而产生本民族文化在承传中的“变异”。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获得语作家具有社会文化语境上的优势,有着其他作家群不具备的在身份认同上的跨界性,由此在创作风格和题材上也更具广泛性。更重要的是,获得语写作具备的天然优势是他们既能够开拓海外市场同时又兼顾国内市场,这对壮大华人文学的创作队伍来说功不可没。但是,作为一个正在不断发展壮大的作家

群体,读者对他们也提出了更高的期待。第一,用外语进行创作要求作者自己的外语水平要不断提高,才可以在语言上与居留本土作家比肩。第二,获得语作家虽然是国际意义上的外国人,可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难斩断“我是中国人”的这条根,他们要做的不是一味地否认自己的华人身份,也不是一味的去认同。第三,获得语作家的外语创作与其他类型华人作家相比具有天然的优势。思维的转换、语言的陌生化、中西意象的置换与糅合等都是其他华人作家群难以企及的,这使得他们代表的“华族”文学和文化在世界文学的浪潮中发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海外华人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来讲,获得语作家是承担这极具创新性、挑战性任务不可或缺的力量。

#### 参考文献:

- [1] 赵毅衡. 三层茧内: 华人小说的题材自限[J]. 暨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2): 45-50
- [2] 胡适. “新思潮”的意义[J]. 新青年, 1919(7): 1
- [3] 饶芃子, 费勇. 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J]. 中国比较文学, 1996(4): 93-105
- [4] 融融. 历史漩涡中的北美新移民文学——从《一代飞鸿》谈起[J]. 华文文学, 2011(6): 61-66
- [5] Jeffery Paul Chan. Lecture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Elaine H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75
- [6] Ling-chi Wang. The Structure of Dual Domination: Toward a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 [J]. Amerasia Journal, 1995(21): 1-2
- [7] 陈瑞琳. “离散”后的“超越”——论北美移民作家的文化心态[J]. 华文文学, 2007(5): 35-39
- [8] 戴瑶琴. 论海外“70后”华人作家的文学想象[J]. 华文文学, 2016(2): 45-49
- [9] 庄伟杰. 海外华人流散写作的文化境遇与身份迷思[J]. 当代文坛, 2017(2): 9-14

(责任编辑: 刘鑫)